

第三章 歷史背景與環境條件

就政黨起源理論的歷史情境學派而言，歷史結構條件對於政黨與政黨體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某個時空條件下所發生的危機（不論是涉及合法性、參與或整合的問題），當時的制度結構倘若不具有化解的能力，政治體系為維持正常功能與穩定性，必須在制度上進行調整或創新，而政黨與政黨體系就是這種歷史結構條件下的產物。本文此處擬從歷史的縱向面說明台灣政黨體系演進的過程，並從制度環境的結構條件初步分析促使台灣政黨體系發生幾次明顯變化的可能因素為何。

第一節 歷史背景

如前所述，學者 G. Sartori 從政黨體系分化與極化的程度來探索政黨體系的性質，他以「每一」政黨的「議席數」（兩院制國家以下議院所佔議席的百分比來表示）和「每一」政黨的「治理潛能」或「作為聯合政府的潛能」來分類，將政黨體系分為七種¹：

- 一、一黨制 (one party)：獨一無二的政黨。
- 二、霸權黨制 (hegemonic party)：一個霸權黨和若干附庸黨。
- 三、優勢黨制 (predominant party)：一個優勢黨和若干小黨。
- 四、兩黨制 (two party)：交替執政的兩黨。
- 五、溫和多黨制 (limited pluralism)：有三至五個政黨，彼此間意識型態差距不大，通常對政治體系的基本原則都具有認同感。
- 六、極化多黨制 (extreme pluralism)：有六至十個政黨，至少存在一個反體制的政黨，各政黨的意見在政治光譜上的分佈很分散。執政黨通常會面對來自左右兩端的反對。
- 七、粉碎多黨制 (atomized pluralism)：十黨以上。

其中一黨制與霸權黨制是屬於「非競爭性」政黨體系，而其餘是屬於「競爭性」政黨體系。按照 Sartori 的分類，1949 年至 1986 年台灣是屬於「霸權黨」的政黨體系，有一絕對支配而不允許（組織化）競爭的政黨—國民黨，另有二個次要、次等級的政黨—民主社會黨與青年黨；但在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之後，一個具有意義的反對黨出現，台灣由「非競爭性」政黨體系轉入「優勢黨」型的「競爭

¹請參閱 Sartori, G.,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1976, chap. 5; pp218-222.

性」政黨體系。當時，民進黨還沒有與國民黨交替執政的能力，且其反體制的特徵（主張台灣獨立建國）還不明顯。政黨競爭的基本格局是「一大一小」的型態。

1993 年新黨脫離國民黨而獨立組黨，其旗幟鮮明主張統一的立場與主張獨立愈趨明顯的民進黨，形成政治光譜兩極的對立勢力。此時，民進黨的勢力已略有增長，而國民黨則由於新黨對其選票的瓜分，實力明顯削弱，因此政黨競爭格局成為「二大一小」的型態，應無疑義。若按 Markku Laakso 和 Rein Taagepera 所發展出來的公式²來計算有效政黨數目，1995 年立委選舉的有效政黨數目為 2.55³，台灣的政黨體系顯然已朝向多黨體系發展。比較弔詭的是，若以政黨體系分化的程度而言尚非一個完整的多黨體系，但以政黨極化的程度而言卻具有 Sartori 類型學上極化多黨體系的某些重要特徵，如台獨主張日益明顯的民進黨，在角色扮演上類似反體制政黨，而執政的國民黨同時面臨來自新黨與民進黨雙邊的反對，這使得 Sartori 的分類標準出現無法涵括某種特殊政黨體系類型的漏洞。在採取嚴格分類定義的情況下，本文只能將此時台灣政黨體系稱為「準多黨體系」。2000 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取得執政權，而脫離國民黨的宋楚瑜則另組親民黨，試圖採取溫和穩健的中間路線。2001 年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黨」）成立並採取比民進黨更激進的台獨本土路線。此時的有效政黨數目增至 3.48⁴，顯示台灣政黨體系進一步的分化，而正式納入「多黨體系」的類型中。而由於民進黨的執政，使得在 1995 年至 2000 年間執政黨面臨的雙邊反對轉換成單邊反對，且出現了極化多黨體系所罕見的反體制政黨組閣的現象，因此減少了台灣政黨體系中某些屬於極化多黨體系的特徵。至此台灣已由「準多黨體系」類型轉變為偏向「溫和多黨體系」型的類型。

在台灣進入競爭性政黨體系之前，是屬於國民黨一黨支配的「霸權黨制」，但在形式上存在三個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政治權力全由國民黨獨佔，民社黨與青年黨的附庸角色十分明顯。台灣出現一黨霸權政黨體系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也有與鄰近東亞各國相近的原因。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敗

² 該公式為：

$$N = 1 / \sum P_i^2$$

請參閱 Markku Laakso & 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2, No.1(April 1979), pp.3-27.

³ 陳佳吉，《台灣的政黨競爭規範與民主鞏固》，台北：翰蘆，2003，頁 346。

⁴ 同前註。

退台灣，實施戒嚴，限制人民權利，禁止政黨活動，國民黨壟斷絕大部分的政治資源，建立絕對支配的黨國體制，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集中一切力量對抗海峽對岸強大的敵對政權。然而另一方面，一如鄰近的東亞其它國家，二戰之後飽受戰亂、騷動與貧窮困擾的該地區，強有力的政黨與國家機器是政治安定、經濟復甦的唯一希望。東亞各國普遍由原先的多黨體系轉變為一黨體系，並不令人意外。正如 Huntington 所強調的，一黨制多發生且盛行於追求現代過程的初期與中期，並非歷史的偶然。因為一黨制是由政治體系內較為現代化的社會力之領導者所創建，企圖對抗較落後及傳統的社會力。通常，獨占政治資源的支配性政黨會提出建國的政治理想，並成為指導政治建設藍圖的執行者。因此，霸權黨作為現代化的推手，只要能夠達成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目標，其統治正當性便得以延續。事實上，台灣在兩蔣統治的期間，國民黨的威信隨著快速的經濟成長而強化，然而弔詭的是，隨這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開放也對國民黨霸權體制造成威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產階級的新富與知識份子的大量出現，強烈期待於政治決策過程中有更多的參與。面對異議份子的要求，國民黨高層也無法斷然拒絕，因為在其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實踐民權主義思想，建設中華民國為民主國家，是必須逐步落實的終極目標。1970 年代，國民黨透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修正，擴大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增補選的名額，提供人民有限度的民主參與管道，也讓非國民黨人士擁有發展勢力的機會。1980 年代，蔣經國「本土化」的政策所捲起的「吹台青」風，讓台籍菁英在政治體制內有了更大的發言權與實際權力。另一方面，隨著反對人士不斷串連與集結，選舉競爭中國民黨已非唯一的組織性力量，而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也逐步升高。至此，台灣政治體制與政黨體系的轉型其實只是時間的問題。

下文所述，正是從台灣過往的歷史背景中探尋反對黨組黨的原由，以及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與台聯黨先後組黨造成台灣政黨體系類別變換的意義。它們的出現，不僅是政黨數目上單純的改變，對於政治權力關係與政治發展的穩定性，也產生明顯的影響。茲分述各黨組黨的歷史背景如次：

一、 民進黨組黨的歷史背景

早在民進黨組黨之前，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就已進行了很長的時間。甚至於追溯至日治時代，與政治反對勢力有關的運動或事件就包括：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0 年）、台灣文化協會（1921

年)、治警事件(1923年)、二林事件、(1923年)、台灣農民組合(1926年)、台灣民眾黨(1927年)、「台灣民報」在台印刷發行(1927年)、台灣工友總聯盟(1928年)、台灣共產黨(1928年)、台灣新民報(1929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年)等。這些反對運動在日本高壓殖民統治之下，其扮演思想啟迪的角色遠大於實質反對力量的角色⁵。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由於戒嚴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使得反對運動的發展遭受壓制，但在國民政府允許地方實施有限民主的情況下，也產生了一群個別獨立的反對菁英。這些台籍菁英與渴望民主的大陸人士相結合，對於台灣早期的政治自由化產生了某種催化作用。最重要的運動與事件包括：二二八事件(1947年)、「自由中國」雜誌創刊(1949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雷震案)(1957年)、「文星」雜誌創刊(1957年)、「大學雜誌」論政(1968年)等⁶。這段時間的反對勢力仍未組織化，但由於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使得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的名額逐漸增加，也產生一些具有全國知名度與政治實力的反對菁英。

1975年底的立委選舉，康寧祥、黃順興、許世賢等人以「黨外」的名義競選而當選，國民黨終於面對一個強大、準組織的反對團體——黨外，儘管它的界定含糊，定義籠統，但卻是一個簡短而有力的號誌⁷，在1980年至1985年民進黨成立之前，「黨外」均獲得高達二成以上的選票，得票率相當穩定，但其席次率卻很難與其得票率成相應的比例，主要原因在於提名策略的錯誤與組織動員能力仍有所不足⁸，這種情形其實部份解釋了何以「黨外」要走上組黨這條路。民進黨組黨應視為台灣政黨體系重組的第一個階段。然而在型態上，此時台灣的政黨體系仍是 Sartori 概念下的「霸權黨制」類型。國民黨在政治與選舉事務上具有絕對的支配力量。

二、新黨組黨的歷史背景

1986年台灣由於民進黨的成立，政黨體系從非競爭的「霸權黨」體系轉變成競爭的「優勢黨」體系，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首次面對一個合法又組織化的政治反對力量，且其日益明顯傾向台獨而具

⁵ 請參閱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頁11-12；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上冊（戰前篇），台北：玉山社，1999，頁134-161。

⁶ 李筱峰，前引書，頁17-21，46-49，60-66，80-83。

⁷ 同前註，頁84。

⁸ 盛杏媛，《國民黨與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選舉競爭之研究》，台北：桂冠，1986，頁155-64。

備反體系的巨大潛能，讓國民黨內部開始有保衛執政權的壓力。1988年蔣經國去世，強人不再的國民黨，面臨了內部權力重新分配的考驗，許多黨內的既得利益者與政治新秀似乎都顯得焦躁不安。爭權的槓桿很明顯的以本土化以及制度改革（黨內民主化）的內涵、速度及方式作為支點，最後兩邊較量的結果分為主流與非主流。至此，國民黨的分裂已可預見。

1989年趙少康、郝慕明、丁守中、李勝峰、何智輝、蔡壁煌、周荃、陳癸淼、洪秀柱、洪昭男、王滔夫、吳耀寬、簡又新、沈智慧等人組成國民黨次團 - 新國民黨連線。李登輝透過宋楚瑜向新連線表達「不准組次團」之立場，新連線則因集思會的「林鈺祥案」⁹向黨中央要公道。1990年三月政爭（臨中全會），讓李登輝對與李煥、郝伯村接近的新國民黨連線成員十分不悅。他運用「省籍分化」的方式，希望將「新國民黨連線」徹底打成一個「外省人的次級團體」。最後形成「新連線」與「集思會」火拼的局面。¹⁰1993年，「新連線」與國民黨決裂，新黨正式成立，台灣「優勢黨」型政黨體系因國民黨的分裂以及隨著民進黨聲勢看漲而朝向多黨體系發展，且由於李登輝為了維持國民黨的主流地位而巧妙地操作省籍因素，從而激化了族群對立的情緒，在這階段民進黨反體制的傾向也最為明顯，但因政黨體系分化的程度尚較輕微，性質上尚未到達 Sartori 定義下「極化多黨」體系的標準，本文將其視為「準多黨體系」。

三、親民黨組黨的歷史背景

親民黨的組黨如同新黨當初出走一樣，主要肇因於國民黨內部菁英的對立與分裂。原本宋楚瑜與李登輝之間的關係「情同父子」，當蔣經國去世時，宋楚瑜在國民黨中常委會議上，起立發言，結合當初的國民黨少壯派，將李登輝推上了黨主席的位置，李登輝當年得以穩固其在國民黨的領導控制權，而李登輝也不忘記投桃報李，一路提拔宋楚瑜擔任國民黨秘書長、台灣省政府主席等黨

⁹集思會秘書長林鈺祥主張解散國民大會、要求老國代退職，卻遭到黨紀處分，新國民黨連線要求「黨中央收回成命，公佈考紀會委員名單」。請參閱江易平、李祖舜，《逆水而行-新黨故事》，台北：商周文化，1994，頁26-27。

¹⁰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動員各方人脈向新國民黨連線的本省籍立委喊話，運用各種關係與利益要求他們離開新國民黨連線，譬如教育團體出身的蔡壁煌因洪性榮（彰化同鄉）的勸說而退出「新連線」，而且在立法院發言時寫下「痛心疾首」四字，以示不與「新連線」同流；無法勸服利誘的，像李勝峰，則拔掉其台南縣選區的樁腳，逼其退選；像陳癸淼，則發動長榮集團輔選澎湖同選區同黨有弊案的林炳坤；或以官職籠絡，如簡又新讓其擔任環保署長，之後再任交通部長。請參閱江易平、李祖舜，前引書，1994，頁33-34。

政要職，且提名其競選第一屆民選的台灣省長而獲得勝選。這樣的情誼最後卻因國民黨內中生代的卡位戰與推動「凍省修憲案」而引發宋楚瑜與李登輝之間關係的急速惡化。台灣媒體一般的報導均指出，宋楚瑜當年競選省長的成功令李登輝產生戒心，而宋楚瑜又挾其民意基礎，要求競選總統、打破了國民黨歷來的傳統，也令李登輝不滿。李登輝隨後發動「精省」、「凍省」，試圖局限宋楚瑜，並確認連戰為「李登輝的接班人」後，宋楚瑜則以辭職不退黨，堅持競選相應。迫使國民黨開除宋楚瑜黨籍，而宋楚瑜在黨體制內建立的組織，則隨他而去，造成國民黨在台灣的第二次大分裂，也導致國民黨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首次失去了執政地位¹¹。

親民黨是宋楚瑜離開國民黨後，以「臺灣人服務團隊」的名義，獨立參選總統，在 2000 年的選舉中獲得了四百六十餘萬票，雖敗猶榮¹²。選後這股力量促使了親民黨的誕生。親民黨在草創初期，曾一度研議保持政治聯盟的形式，而不要拘泥於非成立政黨不可，但在立法院前院長劉松藩先生的力促下認為臺灣必須要有新的政黨力量，來穩定國民黨的挫敗及及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浮動的局勢。因此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召開成立大會，全體代表決議通過親民黨首任黨主席由宋楚瑜先生、副主席由張昭雄先生擔任。親民黨成立，不但大量吸收了新黨的公職人員與支持群眾，更造成台灣既有政黨體系的劇烈變化。親民黨創黨初始，在未經立法委員選戰洗禮的情況下，在立法院中就擁有自動加盟的 19 個席次，席次佔有率為 8.6%，使得台灣政黨體系中的有效政黨數目提高到 2.68¹³，又往多黨體系的方向前進一步。不過，在政黨類型上，仍屬於「準多黨體系」。一直到了 2001 年第五屆立委選舉，親民黨一舉拿下了 18.6% 的選票與 46 個席次，加上台灣團結聯盟所取得的戰果，台灣才正式進入多黨體系。

四、台灣團結聯盟組黨的歷史背景

欲探索台灣團結聯盟組黨的原因，就必須回溯至 2000 年總統大選期間連戰與李登輝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述，連戰在國民黨中生代

¹¹ BBC 中文新聞網站，「宋楚瑜：備受爭議的政壇明星」，2004/8/8，2007 年 8 月 17 日擷取自網站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3544000/35441852.stm

¹² 請參閱彭懷恩，前引書，頁 138-139。

¹³ 此時為立法院第四屆第三會期，各政黨席次佔有率為：國民黨 - 52.0%，民進黨 - 30.3%，親民黨 - 8.6%，新黨 - 4.1%，無黨籍聯盟 - 3.2%，按拉克索和達哥佩拉公式計算由校政黨數目為 2.686。各黨席次分配與席次率請參閱黃德福，「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競爭」，《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2 期，2000 年，頁 1-24。

的卡位戰中原為李登輝最後欽定的接班人，但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期間，兩人的關係卻起了微妙的變化。李登輝與連戰之間的路線與權力矛盾，打從選戰白熱化之後，就一直為連李周邊的人所挑起。首先是連戰的輔選大將徐立德主動找上辜振甫，盼其出面勸李登輝能在選前提前辭去國民黨黨主席，才能擺脫連戰是李登輝的「兒皇帝」的形象，真正為連戰助勢。其次，在 2000 年二月二十八日，曾經在上屆總統大選與李連打對台的陳履安，公開召開記者會，跳出檯面支持連戰並呼籲李登輝應該即刻辭去黨主席，才對國民黨的勝選有幫助。

李登輝對於連營的動作，自然心裡不是滋味，而事實上早在大選初期，李登輝的幕僚群就已經出現嚴重分裂的情況。在擁連與挺扁的不同立場激盪下，若干幕僚對於連戰為少數人士包圍不表認同，高度懷疑連戰日後的政策路線是否傾斜，兩派人士動輒針鋒相對、冷言激辯。其次，李登輝對於連戰某些競選策略也不以為然。譬如連營尋求蔣宋美齡、陳履安的表態支持，就讓李登輝認為只重視佔 15% 的外省族群選票，卻忽略了佔 85% 的本省族群選票。連李關係進一步惡化則因李登輝的摯友奇美集團負責人許文龍發表「挺扁」談話。許文龍認為，只有陳水扁當選才能繼續李登輝路線，連戰早已經背離了李登輝的精神。2000 年大選結果，連戰慘敗。開票當晚，中央黨部門前開始聚集無法接受國民黨失掉政權的憤怒民眾，要求李登輝下台。在木柵召開的黨政研討會，自稱「改革派」的連系立委當面對李登輝展開了嚴厲的批鬥，他們指著鼻子砲轟黨負責人是敗選的最大禍首。在李登輝詢問連戰其黨主席是該辭還是不辭時，連戰的回答竟是「應該愈快愈好。」¹⁴至此，連李兩人的分裂已成定局。

2001 年 7 月當時國民黨新主席連戰先生之兩岸關係政策與李登輝觀點明顯不同，連戰認為臺灣可以和中國成立一個中華聯邦，並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黨對黨之對話機制，此論點激起國民黨中所謂本土派的反彈。李登輝曾經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且於其主政時期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是國民黨在 16 屆黨代表大會決定將兩岸關係政策重新以國統綱領為依據，而放棄了李登輝主政時期的主張¹⁵。2001 年 7 月 2 日與黃主文開始召集有意參選人士會商，針對將來想要籌組政團的名稱、成立宗旨、章程及提名名

¹⁴ 鄒景雯，「李登輝拼命輔選連戰反遭逼宮」，《南方快報》，2004/01/19，擷取自網址：

http://wl.southnews.com.tw/snews/2004/00/2004_010.htm

¹⁵ 請參閱彭懷恩，前引書，2005，頁 139。

單，均有較明確的輪廓¹⁶。在 7 月 24 日由黃主文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公開「臺灣團結聯盟」新政黨名稱、黨徽及黨旗，黨綱則繼承李登輝要走的本土路線¹⁷。特別的是「臺灣團結聯盟」確認「臺灣優先」為宗旨，對於兩岸關係則強調「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國民黨以國統綱領為基調之兩岸關係。2001 年 8 月「臺灣團結聯盟」在李登輝的支持下成立，其目標為提供不滿現狀之臺灣本土政治人物及臺獨人士一個活動及言論的空間，「臺灣團結聯盟」在社會及政策上的議題之態度也比民主進步黨還要保守。從李登輝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李扁常連袂出現在公開場合上宣揚本土精神。2001 年年底第五屆立委選舉，台聯獲得了 7.8% 的選票與 13 個席次，使得台灣政黨體系中的有效政黨數目成為 3.48，在政黨型態上，已正式進入多黨體系的類型，且由於台聯成立的宗旨之一為鞏固本土政權，使得剛執政的民進黨僅面臨來自泛藍單邊的反對，在性質上較類似 Sartori 所說的「溫和多黨」體系。

回顧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幾項特色：第一，政黨體系朝分化的方向演變，有效政黨數目逐漸增加，政黨體系的類型也在極短的時間內由「霸權黨制」轉變為「優勢黨制」、「準多黨體系」，以至目前為止的「溫和多黨制」。第二，主導政黨體系重組的力量來自政黨菁英的合作與分裂，新政黨的出現與選民自發的政黨認同增減或轉移並沒有太大的關係。第三、民進黨成立之後，台灣政黨體系分化的區塊顯然以泛藍的陣營為主，泛綠陣營相對而言較為穩定，即使台聯的出現，也以國民黨的本土菁英為主，僅吸納少部分民進黨的人才。

第二節 環境條件

本文在文獻探討中曾歸納政黨重組現象發生的因素，包括漸進條件下的社會分歧結構與世代交替因素以及突發條件下的重大危機、議題對立和第三黨的效應，這些因素可說是行為學派藉由政黨重組概念解釋政黨體系變遷的重要根據。然而本文也在前文的論證中分析過社會分歧結構的概念對於新生政黨體系不斷重組的現象缺乏解釋力。同樣地，世代交替因素也由於新生政黨體系方始形成，新世代對於政黨尚未產生穩定的認同，因此也無所謂「交替」的問

¹⁶ 請參閱臺灣團結聯盟網站 <http://www.tsu.org.tw/history2001.php>

¹⁷ 所謂的本土路線就是臺灣優先，就是臺灣獨立路線，正名路線，就是以「穩定政局，振興經濟；鞏固民主，壯大台灣」四項原則，提出十二項政策綱領，作為臺聯號召全民一致奮鬥的目標。

題，因此這個因素對於理解政黨新組與政黨體系重組現象的助益甚微。至於第三黨的出現，與其說是政黨體系變遷或重組的原因，不如說是伴隨著政黨變遷的外顯現象或結果。事實上，一個有影響力的第三黨並非一般民眾一時興起急就章的臨時組合，反而常是舊政黨菁英之間的分裂或非政黨菁英所領導的社會運動團體的轉型所致，這在本文分析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歷史背景時，也獲得印證。第三黨能否站穩腳步，相當大的程度取決於菁英的策略能力與當時的制度結構。然而研究政黨重組的行為學派甚少在菁英意向與制度結構上多所著墨。相反地，在政黨變遷的研究中，以「政黨互動」為研究取向的學者，基本上強調的就是菁英彼此之間的權力與策略運用受到或對於制度結構的影響。而制度結構在廣義上包含所有關涉政治的制度，而政黨與政黨體系自然也被視為一種制度。此外，在關於政黨變遷的研究文獻中，我們也可以很輕易地發現族群因素在某些國家或地區中對於某些政黨的誕生具有直接的影響力，同時也是形塑政黨互動關係的重要原因。不過，在西歐民主國家，作為社會分歧結構一環的族群團體，是隨著制度的演變（如選舉權的擴大）而逐步納入政黨體系之中，所以在「定型」過程中能夠成為制度本身牢固的一部份；但在新興民主國家，族群團體建構的政黨在族群意識的排他作用下，很容易以民粹訴求從事反體制的行為，因此不利於國家締造與制度建構而成為不穩定的來源。正是如此，族群意識也是影響新生政黨體系組成與變遷的重要因素，只是不同於社會分歧結構概念，它並非履行「定型」過程中制度化政黨體系的穩定功能。

是以，本文初步的假定是，台灣民主化後的政黨體系的形成與變遷是受到重大危機、議題對立、族群意識、制度結構與政治人物等因素的影響。其中除制度結構是制度性因素外，其餘均為非制度性因素。本文擬藉由這些假定的因素來解析影響台灣政黨體系重組的環境條件。茲分述如下：

一、 重大危機

此處「重大危機」係指對於政治體系產生立即或潛在「解構」效果的內外環境危機，如國家認同、憲政衝突、內亂外患、政黨內部的決策及行動衝突或危害到公共安全與秩序的重大事件等。

台灣在 1950 年到 1970 年代之間，是國民政府來台後的政權鞏固期間，儘管政治上不自由，但在經濟上卻有一定的成就，這至少

在兩方面產生影響：其一，在國民黨政權合法性遭受質疑時，至少其正當性還能為多數人民所接受；其二，人民經濟生活水平提高，受教育普及，中產階級興起，使得人民有興趣，也有能力從事更多的政治參與活動，這對於反對運動的勃興與組織化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基礎。然而時序進入 1970 年代，國內外許多重大危機事件的發生，使得台灣發展型的黨國體制在適應環境變遷上面臨了重大的挑戰。在國際情勢方面，由於退出聯合國、邦交國家遞減、中共外交攻勢轉趨彈性活絡，造成台灣在國際舞台日漸孤立，外環境的危機感雖然一方面促成落實本土、關心台灣的積極情懷，對國民黨延續革命性格的保守格局，卻有意料不到的破壞性。¹⁸外交上的挫敗加速了台灣政治上的自由化。政府賦予台灣人更多參政機會，並解除對非國民黨籍從政者的限制。¹⁹在國內情勢方面，由於體制內的政治參與管道仍然過於狹隘，在野人士不斷透過街頭運動表達異議，因而發生了嚴重影響治安的群眾衝突事件，如中壢事件、橋頭示威與高雄事件，這些事件一方面反映出台灣人民對於排他性的黨霸機制的反撲；另一方面，「黨外」的民意支持已大到不容小覷，遠非禁制或鎮壓所可有效解決。也因此，中壢事件後出現了「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的組織，而高雄事件之前，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全島開了十二家分社，已具有政黨的部份功能。²⁰原先存在黨外內部的兩條路線之爭：街頭路線與議會路線，終因前者嚴重受挫，而讓後者成為反對勢力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也因為面對選戰中國國民黨組織力量的挑戰，黨外也必須發展組織對組織的抗爭。²¹。上述重大危機的發生，提供民進黨思考突破黨禁的必要條件與折衝技巧。

自 1986 年民進黨成立至 1993 年新黨成立，在國際上並無直接影響我國政局的重大危機，在國內則因 1988 年蔣經國去世，產生了政治繼承的問題。儘管按照憲政體制，總統遺缺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但因李登輝在黨內的輩分與聲望均有所不足，而引起執政黨內部權力的衝突；而組黨未久的民進黨，為持續累積能量，採取許多衝撞體制的作為，譬如發動農運(1988 年 520 事件)，學運(1990 年「野百合三月學運」，主張廢「法統」國會)以及個別黨員的過激行為(1989 年鄭南榕為維護「言論自由」而自焚)，凡此種種，均讓國民黨內部許多新生代成員興起揚棄包袱、推動改革的決心。其中以

¹⁸ 請參閱彭懷恩，前引書，2005，頁 64-66。

¹⁹ 請參閱 Hung-mao Tien, "Taiwan in Transition: Prospects for Socio-Political Change," *China Quarterly* 64(December 1975): 617。

²⁰ 請參閱何振盛、杜嘉芬，Denny Roy 著，《台灣政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2004，頁 223。

²¹ 請參閱彭懷恩，前引書，2005，頁 69。

次團「新國民黨連線」的態度最為積極，他們初期的目標是改造黨內領導人的產生方式，即透過由下而上的推選方式來決定黨的領導人，這種模式直接挑戰李登輝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因而形成尖銳的矛盾對立。在1990年七月，新國民黨連線提出「黨務革新專案」，強調黨內民主，主張正、副總統候選人由全體黨員初選之後，李登輝總統就展開一連串排除黨內「反李」勢力的計劃，並欲將新國民黨連線打成全是外省人的族群團體，但未成功。1992年，新國民黨連線進一步主張廢除國民黨中央委員制，反對增設副主席。同年國民黨內部對於總統選制有「委任直選」與「公民直選」兩派，前者原為國民黨修憲小組研議的方案，後者卻為時任主席的李登輝拍板定案。為此，連線成員質疑李登輝的決策模式為走「回頭路」的「家天下」思維。1993年三月，新國民黨連線更舉辦了「請問總統先生」說明會，批判李登輝「叛黨、毀黨、背離中山思想」，同年八月新黨成立。²²

在這過程中，由於台灣民間社會運動逐漸強化對舊體制的衝撞，同時觸發了國民黨內部新生代對其領導階層威權決策的不滿，進而形成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對抗，這一連串國民黨內部茶壺式的風暴，直接牽動的卻是憲政秩序的變遷（總統直選）與族群意識的激化（藉「本土化」之名排斥特定外省菁英，以鞏固當權者的權勢），同時也造成台灣政黨結構另一次的變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黨的出走不是一件單純偶發的意外，而是開啟了國民黨以後持續裂解的骨牌效應。1993年新黨成立之時，宋楚瑜剛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不久，國民黨內部即已出現省長民選或官派的爭議。宋楚瑜原先支持官派，但在李登輝屬意民選的構想並拍板定案後，宋楚瑜亦積極爭取代表國民黨參加省長選舉並獲得提名。1994年12月，宋楚瑜擊敗民進黨候選人陳定南，高票當選第一屆民選省長。但是有關台灣省的憲政定位問題，並未因省長選舉制度的改變而獲得確立，反而在李登輝執意推動「省虛級化」後，成為引爆國民黨再次裂解的重大危機。由於宋楚瑜自恃雄厚的民意基礎，不肯再對中央多所退讓，雙方因此時生衝突。宋楚瑜不但後來經常不出席行政院會議，任期中還一度「請辭待命」，對於中央批判的動作也越來越大，政壇因此傳出「葉爾欽效應」的說法²³。1999年「連宋配」破局後，宋楚瑜逕自宣佈參選第十屆總統大選。2000年大選結果，陳水扁當選總統，這種情勢激起許多泛藍群眾的危機意識，一方面不再寄望於慘敗的國民黨，另一方面則力促以些微票

²²請參閱彭懷恩，前引書，2005，頁129-130。

²³陳詩瑜，前引書，頁81。

數落敗的宋楚瑜組黨，親民黨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同樣地，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而言，「凍省」的憲政危機也間接促成了台灣團結聯盟出現的契機。「凍省」爭議的直接效應固然是宋楚瑜反抗中央與不獲提名而逕自參選，然而泛藍選票分裂因此導致國民黨敗選，卻也形成了連戰敗選必須歸責於李登輝的論調。李登輝的下台、出走與台灣團結聯盟的組黨，也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發生。

二、衝突議題

此處「衝突議題」係指不挑戰政治體系的基本共識，但議題本身的衝突性足以引起政黨內外權力結構之改變，如黨禁、民主化、官僚的權力分際、重要公共政策（如財經、社福、新聞自由等議題）的對立衝突等。

台灣的反對運動在議題訴求特別著重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改革理念。在自由化的議題方面，黨外時期反對菁英對於人權議題有著深刻的關切，對於戒嚴體制下人民自由遭受到的種種限制則展開全力的抨擊。1975 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時代的老將郭雨新所提出的競選政見就包含了這些訴求，如言論、出版、學術、新聞、秘密通訊、集會結社等自由，以及解除戒嚴、軍警憲超然國家化、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情治單位應維護國家安全而非對付黨外自由人士。這些主張可以說是累積了自「自由中國」、「大學」及「台灣政論」等雜誌歷來的訴求內容²⁴。1981 年發生的陳文成命案與 1984 年發生的江南案，可以視為情治單位對於反對運動自由化主張的反擊，但也成為迫害人權的典型案列，這種違法亂紀的事情，自然引起人民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反感，並強化了黨外人士訴求人權議題的正當性。在民主化的議題方面，早在 1958 年「自由中國」雜誌就提出建立「反對黨的問題」，對於「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具有催生的作用。1971 年「大學」雜誌更針對「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問題」提出尖銳的批判，直接挑戰所謂「法統」的問題。1975 年底郭雨新競選時，明白主張「國會定期改選」與建立「強有力監督政府的反對黨」。1981 年十一月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黨外推薦團」提出「民主靠制衡，制衡靠黨外」的共同口號，在這次選舉活動中，出現綠色系統、書寫有「黨外」字樣的旗幟。其組織化的行為已具有雛型政黨的條件，因此謝長廷稱其為「黨外黨」。²⁵在國民黨全面實施三民主義教育之

²⁴ 請參閱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 118-120。

²⁵ 請參閱李筱峰，前引書，1987，頁 59-66；96-98；175-178。

下，民主價值對於知識分子、乃至一般民眾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戒嚴體制下的威權統治，卻與這種民主價值扞格不入。黨外人士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談民主制衡的道理，並強調只有「黨外」才能讓這一套民主價值落實，這雖是國民黨所不願接受的想法，卻是其意識型態本身都無法反駁的。簡言之，在民進黨組黨之前，反對運動藉由自由化與民主化等衝突議題，不斷貶抑國民黨統治的道德性與正當性，並累積自身抗衡的力量。

民進黨成立之後，影響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衝突議題逐漸從國民黨外部移至國民黨內部。如果檢視 1989 年至 1993 年從新國黨連線到新黨成立期間的衝突議題²⁶，可以歸納為下列幾個部分：（1）黨內民主：新國民黨連線不僅針對黨內最高領導權威的合法性加以質疑，對於公職人員的提名方式也有意見。倘若提名方式改變，涉及的就是權力重分配的問題，這對於當時李登輝的領導集團是無法容忍的事。1991 年十一月，李勝峰在國民黨立院黨團提出「立院正副院長人選推荐方法」，中央黨部隨即要求黨團「冷凍」李勝峰。1992 年四月，新國民連線公開呼籲立委提名方式改成以黨內初選決定。1992 年九月，國民黨公布二屆立委提名名單，新連線成員幾乎全軍覆沒，李勝峰宣佈退出第二屆立委選舉。（2）體制改革：新國民連線為了扮演改革急先鋒的角色，針對國家體制所提出的許多改革理念，往往超出既有領導階層的時程之外，而引發奪權的疑慮。1990 年六月，新國民連線郵寄「請退信函」給資深民代，拉開新連線逼退萬年民代的行動序幕。1991 年三月，趙少康提出「直轄市自治法草案」，帶頭為直轄市自治法制化催生。同年 4 月，趙少康提案主張將憲法增修條文中有關總統緊急命令權、國安會及國安局的法源改為過渡條款，並明定落日期限；新連線並針對增額立監委法源，聲請釋憲，並主張解散國會，立即改選，與反對釋憲的集思會水火不容。（3）其他公共政策：1991 - 在政策層面上，新國民連線也常與國民黨中央以及立院黨團不同調。1991 年 8 月，周荃向新聞局下戰書，要求辯論「第四台合法化」問題。1992 年八月，因「十八標案」砲轟交通部長簡又新並使其下台。1992 年 10 月，財政部長王建煊因實價課徵土地增值稅，遭南部地主反對，辭職下台。隨後在新連線力邀下，參選第二屆立委。上述議題上的歧見，使得「新國民黨連線」成員與國民黨中央漸行漸遠，而終致出走組黨。

²⁶請參閱風雲論壇出版社編輯委員會，《新黨挑戰國民黨》，1993，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散見於各章節。

1994年12月宋楚瑜就任民選省長之後，除了因為「廢省」、「凍省」等涉及省自治地位的重大議題與行政院及黨中央抗衡而引發後果深遠的憲政危機，針對其競選期間所做的承諾以及突顯省政府「自主性」的相關議題，宋楚瑜與中央高層也發生數次風波不小的衝突。首先是財政爭端問題，早在1993年3月宋楚瑜剛接任省政府主席時就明確提出「建請中央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以充裕地方自治財源」，希望能讓地方自有財源維持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間。其理由有二：第一，中央政府與台北市的自有財源分別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和百分之九十七，而台灣省政府的自有財源則經常低於百分之四十，顯然不公平與不合理；第二，在1994年之前的三年，省政府為配合中央政策徵收保留地，使得負債巨幅上升至三千多億元，若不改善十年內將增至一兆元。宋楚瑜除了聯合縣市首長提高分貝向中央大聲呼籲外，也數次點名批判財政部長林振國，甚至要求其辭職下台。宋楚瑜的討伐行動雖然促使行政院在1995年8月成立「國家財政專案研究推動小組」，並預計在1996年三月總統大選前提出解決方案，然而選後國民黨內部即面臨中生代卡位戰，宋楚瑜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前案也就不了了之。其次，全民健保、亞太中心等計畫也是省政府與中央抗爭的焦點。對於全民健保，宋楚瑜反對的原因是政府財政問題重重，沒有能力做，又要地方負擔龐大的費用，地方政府根本受不了。至於亞太營運中心，宋楚瑜則顯現出強烈的企圖心，但是他的構想卻與中央處處相悖。譬如金融中心設置地點，中央屬意台北市，宋楚瑜則希望在台中市；境外轉運中心，中央屬意高雄港，宋楚瑜則希望包含台中港；至於媒體中心、電信中心的設置方案，宋楚瑜與中央也都有不同看法。再者，對於省政府的組織編制，宋楚瑜與考試院之間也出現歧見，特別是涉及省政委員的職等、菸酒公賣局、林務局、糧食局等省屬單位是否裁併的問題²⁷。這些衝突議題在一定程度上都傷害到了宋楚瑜在國民黨內長期累積的人脈關係以及與李登輝之間的信任關係，但也為他贏得了民間極大的聲望與支持。然而真正造成宋楚瑜與國民黨中央徹底決裂的關鍵議題卻是在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連戰陣營透過國民黨籍立委楊吉雄所發動的「興票案」指控²⁸，責難宋楚瑜在國民黨秘書長任內不當挪用黨的經費圖利自己與他人，造成宋楚瑜清廉形象的破毀，連帶地也影響選情。後來雖然證明興票案是子虛烏有，然對宋先生的傷害已經造成，宋楚瑜回歸國民黨之路已斷，另行組黨似乎是不得不的選擇。

²⁷ 夏珍，《宋楚瑜—自由自在》，台北：時報出版，1998，頁113-124。

²⁸ 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時報出版，2001，頁136-140。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政黨體系也面臨了巨大的衝擊。對於敗選的國民黨，更產生了何去何從的憂慮感。新任黨主席連戰為了突破困境，刻意在某些議題上與前任主席李登輝有所區別。首先，連戰在「核四案」後對於民進黨的兩手策略深感不滿，因而積極加強在野聯盟的合作關係，其中一個甚具指標性的動作就是在2001年二月九日決定對「興票案」放棄上訴，此後「連宋會」頻仍，頗有合作跡象，李登輝不止一次表示對此耿耿於懷²⁹。李登輝認為，當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作後，國民黨似乎正在一直弱化，最後只靠著錢來凝聚，因此有加以調整的必要；其關鍵要看陳水扁是否有本事掌握調整的主動權，結合國民黨中部分理念類似的人，來形成一個較穩定的政治合作架構³⁰。其次，連李之間在兩岸關係政策方面的歧見也越來越深。李登輝在1999年7月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所提出的「兩國論」，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目的在彰顯台灣國家主權意識，也作為其卸任前對兩岸關係的總結。然而其為國民黨兩岸政策定調的企圖，卻未被其黨內繼承人所接受。連戰在競選期間即一度想以「中華邦聯」的構想主打兩岸議題，後以其敏感性過高而作罷。但在連戰擔任黨主席後，即主張承認「九二共識」，回歸支持「一中各表」原則，明顯與「兩國論」的觀點抵觸，連李關係持續惡化³¹。這種分歧其實適可說明台灣團結聯盟成立時特別強調立足於「台灣本土意識」並與執政的民進黨合作以穩定政局的組黨宗旨。

三、 族群意識

嚴重的族群衝突當然可視作重大危機，但此處「族群意識」指潛在構成政黨體系「解構」或政黨體系重組效果的族群動員觀念。此概念不同於其它衝突議題之處在於其情感或情緒的成分大於理性或理念的特性。

民進黨在組黨前，其基本訴求為「民主」，而非「省籍」，更遑論「統獨」；就以民進黨創黨成員而言，也不乏外省籍人士如費希平、鄭南榕、林正杰、傅正等人；另有支持統一的本省籍人士如朱高正、余登發等人。因此族群意識對於引發此時期的政黨體系重組，並不具有最關鍵性的影響。但是，在以本土菁英為主的黨外集團中，潛藏而隱晦的族群意識卻已隨著霸權黨國體制對反對運動的

²⁹ 陳詩瑜，前引文，頁86。

³⁰ 鄒景雯，前引書，2001，頁176。

³¹ 請參閱鄒景雯，前引書，2001，頁222-230；陳詩瑜，前引文，頁86。

壓制而有逐漸擴大的傾向，甚且最後在民進黨達成民主突破（創黨）後成為其鞏固基盤、擴張版圖的最有力的訴求。反對勢力族群意識的萌芽，與所謂「本土化」議題的發酵息息相關。1975年「台灣政論」創刊後，本土化的議題成為另一個關切的重點。該刊社長康寧祥在創刊號中發表「如何促進台灣的進步與和諧」一文，特別要求執政黨消除政治偏見與省籍歧視。同年，台灣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要求「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崇拜上帝」；1977年更發表「人權宣言」，強調「面臨中共企圖吞併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與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黨外人助選團」提出的共同政見包括「反對省籍和語言歧視，反對限制電視方言節目時間」。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住民自決」成為黨外的首要共同政見，但因國民黨當局認為有濃厚的「台獨意識」，而遭中選會予以刪除。1985年的地方選舉，「黨外後援會」以「組織新黨」與「住民自決」為主要訴求，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³²

另一方面，鄉土文學的興起提供了台灣人族群意識滋長的沃土。台灣在1970年代就出現描寫農村樸素生活與情懷、表達社會下層民眾的苦難與願望的文學，這些都被視為「鄉土文學」。主要作家包括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以及60年代後半崛起的黃春明、王禎和、王拓及楊青矗等人。然而彭歌、余光中等來自大陸的文人卻批評鄉土文學為「工農文學」、「普羅文學」、是狹隘的「地方主義」。「鄉土文學」作家則反駁，「現代主義」文學脫離土地與人民，是沒有靈魂的軀殼。這個論戰不僅是文學理念的論戰，還隱含著族群意識的抗衡。「鄉土文學」中對於鄉土熱愛的想法，「一方面承繼了日治以來的『鄉土意識』，另外一方面則重新確立了台灣自我的主體性。」（見王拓《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一文）因為，「『鄉土』並不只是共同生活的空間社區，更已成為命運與共的歷史社群。原本不信任國家、控訴國家不義的人道關懷，已經轉為打倒舊國家、另立新國家的政治訴求，結果，一個原本內涵多元、文化為主的民間運動，逐漸蛻變為一個帶有本質主義傾向、政治主導的新國家運動。…由此所衍生的『台灣民族本質論』和『獨立建國目的論』，也導致愈來愈排他的認同分歧」（見郭正亮《在眾聲喧嘩之中悠揚——本土化運動的變奏》一文）。³³或

³²請參閱李筱峰，前引書，1987，第四、五、六章。

³³王拓與郭正亮的觀點，轉引自宋強，《文化的回歸，立場的回歸》，2006年6月4日摘錄自網址：http://culture.163.com/edit/000712/000712_32039.html

許，正是基於這種族群認同的排他性，民進黨成立後的幾年內，原先共同創黨的外省籍人士紛紛求去，也使得民進黨往後在歷次選舉中所獲得的選票，幾乎高達 95% 來自本省籍選民，在外省族群中的支持者則相當有限。

同樣地，儘管「新國民黨連線」在 1989 年成立時的主要訴求是「反金權、反台獨」，但是直至新黨成立之前，連線成員對於所謂「統獨」問題，其實著墨並不太多。反而是黨內民主化、體制改革與重要公共政策才是新連線關切的重點。然而隨著政治上的對手，不斷以暗含或明示族群對立意識的話語，削弱新連線訴求的正當性，致使新連線必須正面回應這樣的指控，而形成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族群對立的表面化與白熱化。加上夾雜著國家認同的「統獨」問題，使得這個衝突矛盾更形複雜難解。整個過程明顯的從流派之爭演變成族群對立，而操作族群意識者在經過簡單的族群人口比例的算計後，知道這個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資穩賺不賠，因而樂此不疲。

李登輝初登大位時，為鞏固其權力基礎，藉助本省籍財團與地方派系的力量來排除長期主控黨中央的外省「黨政軍」綜合體，所以民主化與本土化併時馳張，令外省新一代菁英的生存空間面臨擠壓。再加上結合本土意識高漲的民進黨，許多原本符合社會公平正義期待的政策，只因其主張者是外省籍官員，也遭到執野當權派聯手打壓的命運。1992 年王建煊任財政部長時因實價課徵土地增值稅，遭受國民黨集思會立委（如陳哲男等）聯合民進黨立委予以猛烈攻訐，他們直指王建煊的主張是「外省部長要搶本省地主土地」，一項本該理性論辯的政策，卻演變成充滿仇恨情緒的省籍情結之爭。1993 年國民黨十四全會召開前，黨中央將中央、省市民代及地方行政首長全都列為十四全「當然黨代表」，並且將地方黨部選舉產生的黨代表名額大幅加大，使黨代表的結構對非主流非常不利，就新連線而言，就是封殺其生存空間。1993 年三月十四日，新國民黨連線南下高雄辦說明會，遭群眾暴力相向，係族群激化後的暴力事件。³⁴初期新國民黨連線似乎是族群意識操弄下的受害者，但也隨即找到藉力使力的政治技巧，而能凝聚團結特定支持者的向心力。隨著許多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外省籍人士如許歷農、馮滬祥、謝啟大、高新武的加入，以及舉辦許多直接批判李登輝的活動，如 1993 年 11 月的「紀念孫中山，看看李登輝」說明會等，加以選舉

³⁴ 請參閱王儀、蕭士奇，《新黨之路》，台北：漢斯出版社，1995，頁 26-32；風雲論壇出版社編輯委員會，前引書，頁 12-14；44。

時在統獨問題上策略運用如 1994 年市長選舉，趙少康提出「急獨時間表」等，反過來也對族群的對立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親民黨成立之前，受到族群因素的影響顯然比起新黨要小得許多。其主要原因至少包括下列幾點：第一，儘管宋楚瑜具有外省籍的背景，但是他長期追隨李登輝，早已讓他洗脫了外省統治集團的「原罪」，而獲得不少本省菁英與群眾的認同；第二，他任職省府期間已樹立了勤政愛民的形象，又經常為了省民權益而炮打中央，他藉此被選民視為台灣人的代言人；第三，有鑒於新黨始終擺脫不了「外省黨」、「急統」的緊箍咒，在發展上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宋楚瑜在參選總統時就有了巧妙的佈局。他延攬張昭雄擔任副手，頗有一石二鳥的味道。一方面因張昭雄過去親綠的色彩而試圖裂解綠營選票，另一方面因張昭雄籍貫高雄而避免宋楚瑜外省色彩的負面影響並拉攏南部選民的支持。同時，宋楚瑜及其團隊在競選期間乃至選後刻意在統獨立場上保持模糊彈性的立場。儘管族群因素未明顯地影響宋楚瑜的個人發展，但是他對族群因素潛在的巨大殺傷力卻也戒慎恐懼。親民黨成立後，張昭雄仍任其副手擔任副主席乙職，該黨的兩岸關係主張亦試圖嘗試走一條模糊的中間路線。因此親民黨在其公佈的政策綱領中特別強調：「依『三階段整合論』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擱置『統』、『獨』爭議；第一階段進行經濟性及功能性『交流』，開展兩岸經貿互惠合作；第二階段推動兩岸『社會互動』；第三階段則邁向『政治整合』。³⁵」親民黨採取這種路線是為了因應族群因素的敏感性，且從策略上而言，向右可以吸納新黨選票而不致於引起外省族群的反感，向左可以擠壓國民黨的空間，分享「台灣主體意識」的部分所有權，進而使選民支持基礎極大化。

至於台灣團結聯盟的成立，則與族群意識的操作具有極高的關聯性。連戰與李登輝的關係漸行漸遠，其中因素固然複雜，但是與後李時期國民黨是否延續李登輝的本土路線有關。連戰在兩岸政策上放棄「兩國論」，回歸「九二共識」，不再重提「戒急用忍」政策，對於李登輝而言，表象的政策調整尚在其次，從根本上忽略台灣的主體性且更改「台灣優先」的路線，才是無法容忍的錯誤。隨著國民黨內「去李登輝化」的呼聲此起彼落，某些具有本土意識且在黨內面臨邊緣化的菁英，在黃主文的運籌帷幄下終於脫離國民黨而自行組黨。因此，台聯的主要組成份子仍以前國民黨的部分本土

³⁵ 親民黨，「十大主張（兩岸政策主張）」，《政策綱領》，2007年8月21日擷取自親民黨全球資訊網址：<http://www.pfp.org.tw/platform/assert.php?id=4&pid=01>

派成員為主，同時也吸納了民進黨的台獨基本教義派與建國黨的部分支持者。臺聯在其政策綱領中明確提到成立宗旨「是以台灣為主體、以台灣為優先，一心一意為台灣全體人民爭生存、求發展、謀幸福的民主政黨。本黨堅持台灣主體路線，與廣大民眾共同追求締造台灣正常國家，杜絕一切體制化所造成的不公不義，以實現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均富、團結等價值。³⁶」從台聯的政綱看來，其對於「台灣主體意識」的強調與李登輝的理念如出一轍，雖然在黨章、黨綱中多次出現「中華民國」的字眼，但從其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卻可發現始終將「台灣獨立」視為終極的目標。由於臺聯實際作為不斷突顯臺灣本土意識與主體性，不停地去中國化及中華民國化，刻意操弄河洛意識及南部意識，故臺聯為本土化傾向、南部草根化最強之政黨，也是最具有族群意識的政黨，使其在統獨光譜上的位置較之民進黨更接近台灣獨立的終端。

四、法制結構（含選舉制度的改變）

此處「法制結構」係指中央或地方權力來源與結構的法制基礎以及限制或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如中央與地方的選舉制度、政府的組織型態、行政與立法間關係、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以及其它關涉國家發展與大政方針的法令。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體制之下，對政治參與影響最大者乃「萬年國會」及「黨禁」，其次言論管制及政治監控，在人民心理上也不利於參政的積極性，再者行政權的極度擴張，原已不具代表性的立法權更是徹底喪失制衡的功能。但這些「缺點」卻成為黨外人士獲取民主訴求正當性的利器；此外，我國的單記不可讓渡複數選區制度（SNTV 制），也讓在野的黨外人士或獨立候選人有勝選的機會，只是隨著黨外參選人數的增加，得票數也逐漸上升，但是當選席次卻未必成比例般增加。根據盛杏澗自 1980 年到 1985 年幾次選舉結果發現，國民黨與非國民黨在總體選民的得票率變動並不大，換言之，是相當穩定，因此選舉的成敗在於提名策略是否能符合政治現實原則。若是提名策略是符合政治的現實，則有利於席次之擴大，依此標準來看，她發現：「國民黨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的選舉，其所獲席次比例恆大於得票比例的分配。」深究這原因是：「黨外因無固定的組織型態，無法有秩序地提名適當的候選人數，也無法提供有效的輔選工作與分配票源，導致黨外人士所擁有的有

³⁶ 台灣團結聯盟，「宗旨」，《政策綱領》，2007 年 8 月 21 日擷取自台灣團結聯盟全球資訊網址：http://www.tsu.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4&Itemid=48#3

形與無形的政治資源重疊與浪費的情形。」³⁷ 基此，對於參與政治運作的黨外人士而言，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組織，以適當約束與分配黨外的政治資源，就成為當務之急。從這觀點，也就能說明為什麼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在「中央選舉後援會」的會議中產生。³⁸

此外，動員戡亂時期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出現了許多整肅異己的法令工具。譬如「檢肅匪諜條例」，「匪諜」、「通匪」、「知匪不報」的大帽子都在裡面，雷震、余登發等異議人士被捕入獄，所用的罪名即來自此條例。同樣惡名昭彰的是「懲治叛亂條例」，根據這個條例，連罷課、罷工都有可能成為「叛亂」。³⁹ 而違警罰法、檢肅流氓條例更是以維護公共秩序之名，妄加限制人民合憲的自由權利。特別是檢肅流氓條例原於民國 44 年公佈實施，但監察院已於民國 50 年糾正其違法違憲，但經 24 年，行政院未予理會，反於 74 年實施「一清專案」期間完成立法通過。但其「不需犯罪事實，即可提報流氓」的實質內容，仍然違憲。這種現象導致黨外人士與學界批評國民黨缺乏法治精神，並提供反對運動挑戰霸權體制的正當性。

在新黨成立的前十年，係台灣的法制結構進行解構與重組的階段，自 1987 年解嚴並開放大陸探親後，國共的對立關係有所緩和，但也讓強調本土自主意識的民進黨有所猜忌，國民黨內立場堅定的統派—新國民連線，更經常成為民進黨向中國嗆聲的代罪羔羊，反過來也因新連線立場鮮明，在與民進黨尖銳的對抗中，吸引與鞏固了一批立場同樣堅定的選民；1988 年解除報禁後，在多元的新聞自由環境中，形象端正，口才犀利的新連線成員，頓時成為媒體的寵兒，在論述空間上，國民黨非主流與主流力量形成分庭抗禮的態勢，這對於新連線擴大群眾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往後隨著第四台的蓬勃發展與合法化，新連線與新黨更是分佔超乎自身實力的言論市場；1991 年國統綱領的提出，被視為李登輝為安撫國民黨內保守派大老與非主流人士的姿態，事實上之前的國是會議上，民進黨代表認為「國家統一問題」因涉及統獨爭議，且「國家統一」已明顯地預設了統一立場，不該成為協商議題。⁴⁰ 因此這項重大議題最後竟以行政命令而非法律的形式出現，而 1990 年 11 月趙少康在立法院所提出的「兩岸關係法」草案，反而不受青睞，束之高閣。同年，

³⁷ 請參閱盛杏潑，前引書，頁 7-15；155-64。

³⁸ 請參閱彭懷恩，2005，前引書，頁 71-72。

³⁹ 請參閱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篇）》，台北：玉山社，1999，頁 39-40。

⁴⁰ 請參閱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台北：揚智出版社，1996，頁 493。

資深國代全面退職，大幅增加了政治新生代的參選機會，但是國民黨卻因封閉的提名作業系統，使得有心參選的新生代人物必須先獲得關愛的眼神，而以改革自居的新連線在慘遭提名封殺之際，因參與期待落空所產生的絕望不滿，很自然的觸動出走的意念。然而，1994 年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制之完成，卻讓甫成立的新黨獲得在重要政治舞台上的平等發言權，台北縣市長選局中鼎足而三的氣勢，讓新黨成為決定兩大黨誰能勝出的關鍵少數；這種情勢對於新黨的參選機會、動員能力、創新議題乃至於組織發展，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

同樣地，親民黨在組黨之前能夠匯集豐沛的人氣並對政治局勢的走向產生槓桿作用，在相當程度上也受到台灣當時制度結構的影響，除了前已述及的「廢省」、「凍省」爭議引發的地方與中央衝突的憲政危機外，另外就是總統的選舉制度。按照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總統係由國民大會間接選出，但在 1992 年 3 月李登輝於國民黨臨時中常會中決定將總統「公民直選」與「委任直選」兩案併案送交十三屆三中全會討論後，總統選制已從間接選舉朝向直接選舉發展。一方面這能增加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此產生政黨輪替讓國民黨失去政權。因此國民黨內固然有「公民直選」與「委任直選」兩種不同意見，但是黨內的研議小組仍傾向支持保守謹慎的「委任直選」意見。但在 1993 年國民黨歷經激烈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後，郝柏村辭退閣揆，新國民黨連線出走另組新黨，主流派全面掌握黨機器，李登輝也決定在總統選制上採取「公民直選」乙案，以直接訴諸民意來強化統治基礎。1994 年 4 月，國民黨召開十四全臨中全會，果然順順利利通過了總統（公民）直選案，七月，國民大會並以修憲方式通過該案⁴¹。根據新修定的憲法條文，我國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方式係採「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制。這種制度在兩黨體系的國家有其適用性，但在多黨體系的國家由於有利於較弱勢但具有魅力領袖的政黨，因此可能選出代表性不足的「少數總統」。是以，台灣學界不少人主張總統選制應採「絕對多數—兩輪投票」制，以避免少數總統無法有效履行其憲政職責。儘管如此，這對於準備參與 2000 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而言，卻不失為一個有利的選制。在沒有黨政資源與奧援的情況下，憑藉著超高的人氣，多數民調顯示他所獲得的支持率與看好率，均大幅領先對手；即使最終無法以過半票數贏過對手，但只要以相對多數勝出，就能入主總統府。制度的誘因堅定了宋楚瑜的參選意志，也鼓

⁴¹ 請參閱鄒景雯，前引書，2001，附錄—李登輝執政大事記；張慧英，《李登輝執政十二年：1988-2000》，台北：天下文化，2000，附錄—李登輝十二年大事記。

舞了支持群眾勝選的信念。但從結果論而言，相對多數制事實上卻扼殺了宋楚瑜當選的機會，甚至阻斷了他在勝選後重返國民黨的可能性。質言之，我國總統選制若採絕對多數-兩輪投票制，以扁宋得票差距之微，在藍多於綠的選民結構下，宋楚瑜在第二輪投票中擊敗陳水扁的機會很大。或許在這種情況下，宋楚瑜既已接掌政府，未必再以組黨的方式來創造自己的政治舞台。

影響台聯組黨的制度結構因素，一方面與總統選制有關，另一方面則與總統、行政院及立法院三者之間權力互動關係有所牽連。相對多數的總統選制讓陳水扁以不及 40% 的選票當選總統，但是少數總統立即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立法院由泛藍居多數的情況下而能夠穩定政局的難題。這部分又涉及如何詮釋修憲後關於府、院、會之間新的制度設計的問題，亦即，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是否代表總統擁有實質的閣揆任命權。1997 年國民大會修憲通過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其目的在讓公民直選的總統擁有更多的權力，以便在立法院出現三黨不過半時，總統可以運用行政院長任命權來化解可能的政治僵局。就李登輝與連戰所預想的未來政治發展是，總統可望由國民黨當選，但民進黨版圖可能擴張而成為立法院中的相對多數，為確保國民黨總統的政策推行力，其閣揆的任命必須具有主動性與自主性。不料，2000 年總統大選適得其反，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而國民黨反而暫時維持國會多數⁴²。因此，倘若按照制度設計的原始構想，陳水扁以實質的閣揆任命權委由同黨人士來進行政府的組成，勢必面臨國會中支持力量不足的窘境；否則，陳水扁只能與國民黨及其它在野黨協商組成多數執政聯盟，但這又與民進黨自身的利益衝突。其實修憲案的附帶理由已將總統實質的閣揆任命權作了條件限制：「本項調整旨在賦予總統根據民意逕行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力，惟該項權力的行使仍必須考量立法院之政治情勢，任命多數黨可接受之人選。」陳水扁理應選擇與在野黨協商組閣事宜，但在黨內派系意見分歧的情況下，他並未按照修憲旨意任命多數黨可以支持的行政院長，以致於從「全民政府」到「一黨少數政府」均遭受在野黨的抵制。民進黨政府深知少數政府的不穩定與執政的困難，但在衡量自身實力後，明白無法於 2001 年立委選舉中拿下過半席次，因此，李登輝與陳水扁對國會應組成穩定的合作架構形成共識，且此合作架構應由有著相同的意識形態之政黨共同組成，台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⁴³。

⁴² 鄒景雯，前引書，2001，頁 337-338。

⁴³ 陳佳瑜，前引文，頁 94-95。

五、政治人物

此處「政治人物」指個人意向或理念對於政黨興滅或分合產生直接、間接效果的政治活動參與者。

如前所述，杭廷頓在分析民主化來源的類型時，就將台灣歸類於由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的「變革」型態，其中一個最關鍵的人物就是當時的統治者蔣經國。黨外的組織化，乃至於民進黨的組黨，若非蔣經國考量壓制成本高於容忍成本，最終接受一個合法的反對黨存在，台灣的民主發展恐怕還要往後推遲，甚至要引發更多的流血衝突。事實上，在蔣經國主政後的第三年（1977年），國民黨除了面臨地方選舉的挫敗，還遭遇了「中壢事件」的棘手難題。這除了反映部分地方民眾對於國民黨的施政措施不滿外，也顯示國民黨支配者的地位已面臨挑戰。蔣經國特地透過「年輕化」與「本土化」的過程，將國民黨日趨官僚化的權力結構轉化為具有革新傾向的工作團隊，藉以紓解反對運動的壓力。然而隨著「高雄事件」的發生，反對團體不斷對「黨禁」的忌諱挑戰，加上「黨外中央後援會」與「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分別於1983年與1984年成立，在反對勢力一連串組織化運作之下，蔣經國於1986年指派了一個十二人小組研擬改革措施，提出了包括簡化國家安全法律與制訂人民團體組織法等建議。此時，「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醞釀成立分會，蔣經國委請中立學者溝通後予以「默認」。就在同年七月，蔣經國宣示將於一年後解除戒嚴，「民主進步黨」隨即於九月成立。⁴⁴所以美國學者羅伊（Denny Roy）對蔣經國做了一番相當公允的評述：「蔣經國在這段時期的角色是混合的，在他生涯中的多數時刻，他主要扮演著鎮壓支持民主之積極份子的角色；然而他也應贏得推動改革的美譽，一方面，他做出漸進改革的決定，代之以壓制政治上的反對勢力；另一方面，他又能及時於要求改革的喧嚷聲浪及根深蒂固的保守抗拒之間，穩穩的掌舵，安然度過這個紛紛攘攘的局面。」⁴⁵

另一方面，反對運動得以不斷成長，乃至最後組黨成功，當然與反對菁英對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等價值的直接訴求與持續行動努力有最大關係。大體上，反對菁英可區分為批判型與行動型兩類。前者以思想啟迪、言論批判為主，包括參與「自由中國」、「大

⁴⁴何振盛，《戒嚴時期台灣地區的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168-174。

⁴⁵請參閱 Denny Roy,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2003, p.182.

學」、「文星」等雜誌的知識份子如胡適、殷乃光、陳少廷、楊國樞、李敖等人，以及後來以黨外新生代為主的黨外雜誌中的編輯與作家群，包括邱義仁、林世煜、李筱峰等人（他們後來組成「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持續批判監督以公職人員為主的「公政會」）。後者則以實際參政、競選公職為主，包括早期籌組「中國民主黨」而功敗垂成的雷震，個人以無黨籍身分加入公職選舉的李萬居、郭兩新、許世賢等人，以及後來以康寧祥為首，採取議會路線的「八十年代」雜誌社和以黃信介為首，採取街頭路線的「美麗島」雜誌社中的成員，乃至日後黨外「助選團」、「後援會」和「公政會」的成員。學者彭懷恩進一步以位居權力核心或邊陲的概念，將黨外派系劃分為主流派、地方政客派、遊說客派與抬轎派等四類型。⁴⁶其中遊說客派所指涉的政治人物與本文批判型反對菁英的概念類似，而另外三類均可歸之於行動型菁英的概念。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美麗島系坐監服刑的政治人物是直接催生「民進黨」的原動力，即使流亡海外的彭明敏、許信良以及陳婉真等人，對於鼓吹政治反對的理念，也有其貢獻。另外，像費希平這些黨外統派人物，在本質上是國民黨內部反對人士角色延伸出來的，雖在黨外運動中佔少數，但在民進黨組黨期間，因其統派色彩與國民黨一致，加上過去與國民黨的淵源，使其成為雙方談判的要角，且提供民進黨某種保護傘的作用。在民進黨首任黨主席選舉中費希平與江鵬堅對壘，以些微票數敗北。

至於國民黨的分裂以及影響台灣未來政黨體系重組的關鍵人物首推李登輝。作為國民黨當權主流派的領袖，李登輝是影響新黨出走的要人物。他的本土化政策、政治操作風格、對於黨內政治異議者的排斥，乃至於他內心深處的台獨意識，與新國民黨連線的出走絕對有關。因此，成立之後的新黨經常被嘲諷為「反李黨」，足以反證李登輝個人在國民黨分裂上是一關鍵因素。簡言之，李登輝所遭到的批評和挑戰，多源於李登輝式的領導風格和路線方針。⁴⁷就前者而言，是指其缺少兼容並蓄的雍容大度，對於非主流的異議，經常以強勢的態度加以回應，並以權力運作的方式使其根本無法立足，顯然缺乏「協商式民主」的精神；就後者而言，主要指李登輝的重大政策經常搖擺不定，譬如他不只一次表示中國必須早日統一，但卻也不斷強調「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是中華民國」，尤有甚者，將自己領導的國民黨稱為「外來政權」，因而

⁴⁶請參閱彭懷恩，前引書，1989，頁90-95。

⁴⁷請參閱張正莉，《國民黨威權統治型態的轉型（一九八六—一九九二）》，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頁79。

予人「獨台」的口實。⁴⁸其次，對於李登輝登上主席寶座具有臨門一腳作用的宋楚瑜，也是影響新連線與黨中央關係的重要人物。作為國民黨內外省籍第二代菁英，他對於李登輝固有輔佐之功，卻也在省籍情結的衝突中備受新連線成員的質疑。另因與關中有瑜亮情結，連帶對於與關中有深厚情感的新國民黨連線，也抱持拒斥的態度。因此新連線視其為應被「清君側」的頭號大內人物。再者，另一上火線與新連線直接對陣的是「集思會」的領袖黃主文。他創立的「集思會」純粹以吸納本省菁英為主，在李登輝權力尚未鞏固的初期，「集思會」兼做李登輝的智囊、傳聲筒與捍衛者。其與新國民黨連線的衝突，其實正是主流與非主流的代理戰爭。

新黨創黨時的幾位核心人物，是帶領新連線支持者脫離國民黨的要角。而趙少康尤其是最具指標性意義與實際操盤的舵手。他是新黨的發起人與代言人，也是過去新國民黨連線的召集人，新黨初期的聲勢與他有極大的關係。一方面與他形塑的改革形象有關，另一方面與他能言善道且掌握媒體脈動的特質有關，再加上他從競選市議員與立委所獲得的高人氣與壓倒性的選票，讓他成為新黨創黨的主要推手。其次，被視為新黨神主牌位的王建煊，憑藉著無私的道德形象讓新黨迅速定調與定位。夙有「王聖人」、「小鋼炮」之稱的王建煊，反映出他堅持理念的理想性格，因土地實價課稅政策而辭官的事蹟，頗能引起小市民的悲憤與聲援。再者，「智多星」郁慕明擅長謀略，口才便給，鬥性堅強，是新黨初期發展不可或缺的人才。此外，像周荃、李慶華、陳癸淼、李勝峰，以及後來加入的許歷農、謝啟大，均有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具有創造議題、鼓動風潮並且形塑選民認同的能耐⁴⁹。但也因為新黨在體制上採取集體領導的方式，且因創黨「大老」們均是頭角崢嶸的人物，強烈的人格特質使得彼此在意見溝通與協商上經常出現困難，卻也種下新黨日後內鬨的原因。

間接或直接催生親民黨的人物因素，以李登輝與宋楚瑜的關係為主軸，而國民黨中生代之間的權位競逐則是影響主軸關係變遷的助燃劑。王作榮曾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形容李宋關係是「共患難易，共安樂難」。他認為「李宋關係的轉變，國發會的召開與廢省乃是果，不是因。換句話說，即使不召開國發會，不廢省，李宋關係還是要轉變的，…這不是兩人之間的權力爭奪的問

⁴⁸請參閱齊光裕，前引書，1996，頁 523-524。

⁴⁹江易平、李祖舜，前引書，附錄。

題，宋省長並未挑戰李總統的權力，而是其中有更深沉的問題存在，李宋心中都清楚。⁵⁰」王作榮雖未明白點出這是什麼問題，但其前後行文似乎暗示與李登輝心中的省籍情結與對宋楚瑜是否能夠忠實的延續李登輝路線與本土化政策仍有疑慮。然而儘管兩人關係轉變的內在因素並非宋楚瑜挑戰李登輝的權力，但就其本質而言，卻與政治繼承和權力分配的安排有關。1996年李登輝以高票當選民選總統後，輔選有功的宋楚瑜即向他表達最大的心願是當行政院長，由於李登輝未做承諾，讓宋楚瑜深感失望。在此同時，擔任李登輝競選總幹事的蕭萬長，也透過其幕僚表達對於閣揆的抱負。面臨中生代的騷動不安，李登輝原想跳脫原有窠臼，邀請李遠哲組閣，但是宋楚瑜獲悉後立即表達了保留的態度，李登輝只好在既有的框架內請副總統連戰續兼行政院長。不料，此舉與民間的期待落差太大，民進黨乘勢發動「六月政改」，並提出大法官釋憲聲請，拒絕連戰到院總質詢，李登輝則對於立法院提請重新行使閣揆同意權的要求，以「著毋庸議」的強烈姿態予以退回。但為平息不安靜的政治氣氛，李登輝在一個月內進行行政院、考試院與國民黨三波極大幅度的黨政改組，但卻導致中生代的競逐更加劇烈。其中，連戰延攬林豐正擔任內政部長，以及關中升任考試院副院長，在在引起宋楚瑜高度疑慮⁵¹。前者係因林豐正為宋楚瑜在省府的主要副手，連戰之舉在宋楚瑜的眼中如斷其臂膀，極不友善；後者係因宋關「瑜亮情結」由來已久，關中高升，宋楚瑜並不樂見。國民黨中生代的權位競逐伴隨著政治情勢的發展，一直到了李登輝決定「凍省」，宋楚瑜直覺是「削蕃」與「釋兵權」，並以請辭來表達不滿。其後，儘管宋楚瑜仍在省長的位置上「請辭待命」，但其不時炮打中央的行徑，卻不斷加深李宋之間的嫌隙。其間，蕭萬長接任行政院長，宋楚瑜還曾透過連戰與黃昆輝婉轉表達在其卸任省長後，黨應對其出路有所安排（指行政院長位子）。據信，李登輝知道後以非常不悅的語氣回應：「我的個性很像蔣經國，硬要是到不了的。⁵²」至此，兩人的關係已徹底破裂，毫無挽回的餘地。1999年時任黨秘書長的章孝嚴儘管努力撮合「連宋配」，其實早已不濟其事。然而，李登輝何以始終中意連戰，而非宋楚瑜？李登輝對外的說法是「黨內倫理」的問題，但是熟知他的人相信，連戰看起來老實聽話，絕對是關鍵因素，而宋楚瑜形同脫韁野馬的不受約制，任何一個指導型的領導人都不會對他放心⁵³。宋楚瑜的出走，似乎在當時已是必然的

⁵⁰ 王作榮，「天道無親唯與善人」，收錄於夏珍，前引書，序言，頁1-5。

⁵¹ 夏珍，前引書，頁100-117。

⁵² 同前註，頁112。

⁵³ 同前註，頁106。

趨勢，而 2000 年大選的結果與情勢，又驅使宋楚瑜必須組黨來維繫自己的影響力與政治生命。

台聯的組黨則與連戰和李登輝關係的變化有關，在某種意義上仍是國民黨中生代卡位戰與最終權力繼承安排之效應的延續。如前所述，連戰本來就是李登輝親定的接班人，其原因並非連戰政績斐然或民間聲望極高，而在於他謹守本分，奉命行事的風格。這對於具有家父長式威權性格的李登輝而言，這類繼任者最能確保其指導者的地位，且能不斷延續李登輝本土化的路線。然而，李登輝預想的情況並未發生，首先是連戰競選期間，連李身邊的人不斷發生摩擦，而李登輝的至友許文龍又投靠陳水扁陣營，使得雙方開始不具信任感，選前「棄連保扁」的傳聞甚囂塵上，更加深了彼此的芥蒂。其次，選後，陳水扁在新政府的人事部署中，竟出現不少李登輝的智囊成員或幕僚，譬如國策顧問曾永賢、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經建會主委陳博志、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國防部副部長陳必照、國安會諮詢委員葉國興與林佳龍等人，不免讓連營人士懷疑選舉期間李登輝確實暗助敵營。再者，選後群眾包圍中央黨部要求李登輝下臺，連戰也認為他的辭職應該「越快越好」，讓李登輝至感心痛。而連系立委在檢討會上出言頂撞，也讓李登輝視為有計畫的行動。最後，連戰在兩岸政策上改弦更張，牴觸李登輝「台灣優先」的本土核心政策，才導致雙方關係的徹底決裂⁵⁴。就在國民黨內部試圖將李登輝及其勢力邊緣化時，台聯遂成為其子弟兵黃主文等黨內本土菁英結合黨外本土勢力以開創新局之構思下的產物。

經由上述歷史背景與環境條件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自 1986 年起，台灣的政黨體系已由非競爭型態轉變成高度競爭的型態，且政黨體系朝繼續分化的方向發展，在政黨體系類型上由「霸權黨制」歷經「優勢黨制」、「準多黨體制」到「溫合多黨制」，以二十一年的時間而言，變化不可謂不大，而整個過程中重大危機、衝突議題、族群意識、制度結構與政治人物等制度性因素與非制度性因素的影響都非常重要。但是選民是否已經形成穩定的政黨傾向，這是本文在文獻探討中不斷質疑的焦點。因此本文試圖以「政黨新組」來替代「政黨重組」的概念以解釋台灣政黨體系不斷變遷的現象，但對於台灣政黨體系不斷出現新政黨（體系分化）且進行類型轉換，則以「政黨體系重組」的概念視之。然而，台灣政黨體系不斷

⁵⁴ 鄒景雯，前引書，2001，頁 151-167。

重組的過程中，政黨間的互動關係如何改變了憲政體制，以及未來可能影響其變動的方向，這是本文在下文中將進一步探索的重點。